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30 年述评

高瑞阔
（皖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尽管“最近发展区”（ZPD）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研究，但误解和争议不断。为进一步廓清相关概念，梳理研究发现及存在的问题，采用范围综述的研究方法，检索并筛选出 1994 年以来 SSCI 和 A&HCI 相关研究文献 107 篇，国内核心文献近 10 篇，进行内容和方法分析。研究发现：已有研究存在对 ZPD 解读差异大、与相关概念界限不明、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有待进一步优化等问题。进而提出，未来应加强 ZPD 理论的本体研究、ZPD 内二语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和基于 ZPD 的动态评估应用研究。

关键词：最近发展区；外语教学；范围综述；应用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5)05－0446－09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50423200

A Critical Review of Thirty-year ZPD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GAO Ruiku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237012,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theor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there are still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troversies. To further clarify relevant concepts and present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article employs a scoping review research method, retrieving and screening 107 SSCI and A&HCI related research articles since 1994, and nearly 10 domestic core literature articles, to conduct content an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large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ZPD, unclear boundaries between related concepts,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to be optimized.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ontological study of ZPD theor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ZPD, and dynamic assessment based on ZPD.

Keywords: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coping

收稿日期：2025－04－23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F2019D053）
第一作者：高瑞阔，男，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E-mail：rkgao@163.com

review；application

自从 Aljaafreh 等在国际著名语言教育类期刊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发表首篇关于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理论在二语教学中的应用[1] 的研究论文，迄今已过去整整 30 年。作为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ZPD 理论是应用最广泛、对很多学科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2]。该理论由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创立。在 Vygotsky 对文化和教育心理学所作的诸多贡献中，ZPD 在西方繁殖最广、影响最大[3]263。Ohta 指出，ZPD 在二语和外语发展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二语习得研究路径中一个激动人心而富有成效的转向，不断催生新的学术活动[4]。笔者以 ZPD 为关键词，在拥有 SSCI、A&HCI 等重要索引期刊论文的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数据库检索，获得 695 篇相关文献，其中语言学类期刊论文 107 篇，另有专题或专章论及 ZPD 在二语教育中的应用的专著和论文集十余部，且成果主要来源于北美。同时，笔者以“最近发展区”和“英语教学/二语习得”为关键词检索 CNKI，发现相关研究论文 60 余篇，其中核心及以上不足 10 篇，与西方的研究水平尚有一定差距。本文通过对 ZPD 概念及其在二语教育中的解读和应用研究进行梳理，帮助读者深入领会这一理论，了解其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更好地服务于外语教学和研究。本研究所涉文献涵盖 ZPD 在二语习得、二语教育（教学）、英语教学、外语教学等方面的应用，故本文不区分这些语境，均指母语之外的语言教学。

一、ZPD 的理论解读

（一）Vygotsky 对 ZPD 的定义与诠释

ZPD 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更强的同伴合作情况下能够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5]86。尽管 Vygotsky 对 ZPD 曾有不同阐述，由于后续研究多引用此定义，Chaiklin 称之为 ZPD 的“通用概念（common conception）”[6]41。维氏进一步解释：“实际发展水平”是指已经成熟的心理功能，是发展的终极产品；而“潜在发展水平”则是指那些“处在成熟过程中但尚未成熟的功能，或明天将会成熟但当前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功能”。实际发展水平回顾性地反映了个体的心理发展，ZPD 则前瞻性地显示了这一发展趋势，勾画出儿童很近的将来和动态发展状态。因此，学习的本质就是要创造 ZPD，唤醒诸多内在发展过程，这些过程只有当儿童与周围的人进行互动及与同伴合作时才会发生[5]90。ZPD 理论为人们理解发展的内在过程提供了恰当的视角。

（二）ZPD 在二语教育中的不同解读

Vygotsky 提出 ZPD 的初始用意是为了用作传统智力测试（IQ Test）的补充，以更好地揭示儿童的发展潜能。但由于维果茨基英年早逝，未来得及对其应用作更多说明，ZPD 似乎“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模糊解读”[7]。Lantolf 直呼，或许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所有概念中，没有哪个比 ZPD 受到的歪曲更严重了，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二语研究文献中，也存在于那些声称借鉴了该理论的一般教育文献中[8]。Kinginger 将 ZPD 在北美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解读分为三种观点：技能观、支架观和元语言观[7]。张福慧等梳理了 ZPD 在二语习得中的各种诠释后指出，其解读方式体现了由浅入深、由笼统走向具体的动态发展过程[9]。表 1 列举了部分外语教育研究者对 ZPD 的几种代表性解读，足见学界在理解上的多样性。

在表 1 的解读中，Ohta[10] 的解读与 Vygotsky 的初始定义最为接近。但 Ohta 后来又指出：一是该定义只以课堂教学为背景，而事实上学习者的语言发展可能发生在课外；二是该定义与维氏的原始定义一样，似乎只适用于社会互动语境，事实上成人完全可能利用教材、练习和词典等二语资源通过自我支架实现发展[4]。

如表 1 所示，Guerra 等[11] 将 ZPD 与 Krashen 的可理解性输入“i+1”相提并论，国内一些研究者也持相似观点，但主流研究都坚决反对将二者划等号。国外现有研究中最广泛的解读，是将

表 1 ZPD 在二语教育领域的代表性解读

Tab. 1 Represent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ZPD in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研究者	解读要点
Ohta[10]	由个体语言产出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和与教师或同伴合作产出语言决定的潜在水平之间的距离。
Guerra [11]	ZPD=i+1, i即当前发展水平
Dunn & Lantolf[12]; Thorne[13]226; Kinginger[14]	ZPD与i+1在哲学基础、理论框架和实证依据上都不具可比性。
Chaiklin[6]	任何一种掌握了某种技能或获得了某种理解的活动。
Lantolf & Poehner[15]	教师与学习者之间进行的允许个体超越他们实际能力的合作活动。
Holzman[16]	并非静态的“区域”或实体，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文化活动过程，是一种“学习引领发展”的社会实践，是个体无意识协作与集体创造的过程和结果。
Poehner &Lantolf [17]	不仅涉及知识迁移（transposition），还包括创造性转化（transformation）

ZPD 看作一种互动活动[6, 15, 18]。ZPD 活动说似乎更能揭示语言发展的动态性，以及学习者语言发展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但这种解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因为其模糊了 Vygotsky 原定义中“区间”和“距离”等概念，忽略了其对学习者发展潜力范围的关注。

二、ZPD 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ZPD 理论在二语/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4 个方面。

（一）聚焦“支架”的 ZPD 研究

早期聚焦“支架”的 ZPD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师生支架方面。首先，支架帮助要基于学习者的 ZPD 才有效[1, 19] 。Lantolf 等发现，学习者功能系统的发展不是一个稳定的线性过程，而是同时包含进步和倒退，从而证明了 ZPD 是一个不稳定的动态系统[20]。他们同时指出，ZPD 内的帮助只有根据学习者的需要进行调整，直至视其反应最终退出才最为有效。Lapkin 等通过对一个看护所居民 Mike 与研究者之间的 11 个对话片段进行研究发现，互动言语（languaging）能够创造积极的情感语境，为 ZPD 的发展提供机会[21]。上述研究表明，专家－新手之间的支架互动能有效创造学习者语言发展的 ZPD，这种 ZPD 是动态的、多元的。

另一些研究发现，生生互动也能互相提供支架，形成有效的 ZPD。de Guerrero 等运用微变化法分析了两个中级水平大学生的同伴二语互改[22]。结果显示，基于 ZPD 的同伴支架帮助是相互的，而非单向发生[22]。Nassaji 等在对话日志（dialogue journal）实验教学中也有类似发现[23]。Ohta 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发现，基于学习者 ZPD 的课堂同伴互动和辅助表演可以使参与者有效内化二语语法知识，提高中介语语用能力[24-25]。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创造学习者语言发展 ZPD 的“支架”是多样的。McCafferty 发现，手势具有创造二语学习 ZPD 的作用[26]。成人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不仅受益于教师的指导和同伴的帮助，还受益于课本、字典等外语文献资源[4]。此外，基于学习者需求的支架（如关键词提示、图画等）也是促进语言发展的潜在工具[27]。

国内学者贾光茂等对大学英语课堂交际互动中教师及同伴的支架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教师和同伴都有提供支架、激活 ZPD、促进语言和思维能力发展的作用[28]。盖淑华发现，由老师和同伴共同组建的团队实行支架式词块教学，学生的词块习得能力和语言综合能力都显著提高[29]。张姗姗等探讨了在 ZPD 视角下在线自动反馈对英语不同水平学习者写作的影响作用，发现对低水平者有帮助，而对高水平者无作用[30]。陈菁等提出，教师应针对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合理构建实时性支架，以促进其认知和思辨力发展[31]。还有研究发现，来自更有能力的他人（包括老师、同学等）的指导，在帮助学习者穿越 ZPD、提高语言习得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然而，许多中国学习者未能充分利用周围的社会文化环境，这限制了他们的学习潜力[32]。

（二）ZPD 的动态评估研究

动态评估（dynamic assessment，DA）是一种

强调互动和过程导向的评估方法，其核心是通过评估者与被评估者的互动调节，揭示个体在特定领域的学习潜力和发展能力，而非当前的知识或技能水平。DA 是基于维果茨基对 ZPD 的理解，即个体尚未完全发展，处于萌芽状态的能力范围，这些能力因而最容易接受教学干预[33]。Lantolf 等将 ZPD 与 DA 放在同一章讨论它们在二语教育中的实践运用，足见二者关系之密切[15]。Vygotsky 和他的同事 Luria 曾利用暗示和提示来观测不同学习者对相同帮助的反应，从而判定不同个体的 ZPD 的大小。其研究表明，ZPD 大的学习者比 ZPD 小者在校学习更成功，而且 ZPD 比 IQ 更能预测在校表现[34]35。Kozulin 等基于他人研究提出了一个测量学习者潜力的公式，即 LPS（learning potential score）=（调节后得分×2−调节前得分）/得分最高值，旨在替代常规的水平测试，帮助教师实施分组教学[35]。Poehner 等运用 LPS 对 14 位汉语学习者的听力和阅读理解能力进行了在线测试，探讨了引入计算机辅助的动态评估手段（C-DA）促进学习者 ZPD 内二语发展的途径[36]。Poehner 于 2011 年开发了通过收集学习者在互动调节中的表现，来诊断其 ZPD 和二语学习潜力的微观和宏观模型，以提高 DA 的效度，实现教学、评估一体化[37]。次年他又通过对参与 DA 实验的法语学习者语料进行分析，探讨了学习者自评与 ZPD 发展的关系，指出在学习者从合作互评转向独立自评过程中，要注意对其自评努力的调节[38]。Compernolle 等深入研究了通过对个体 ZPD 的动态评估促进学习者二语元语用能力的方法、手段及效果[39]。Poehner 等运用 C-DA 手段对学生进行在线阅读和听力测试，发现测试自动生成的得分和学生在理解特定题项时接受分级提示调节所作出的反应，能够为他们的二语发展提供详细的诊断，并为后续教学提供信息[40]。Bakhoda 等基于前人研究，运用自主编程的软件来捕捉学习者在阅读理解测试中对分级调节的反应时间（response latency），以此测定他们的 ZPD[41]。

Infante 等通过分析转录的课堂互动，论证 ZPD 活动表明了教学与评估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交互过程中引发第二语言学习者发展的辩证本质，认为动态评估和中介发展（mediated development）可以共同构成一套连贯的第二语言社会文化教学法[42]。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 ZPD 研究的内容和手段，代表了最新发展趋势。

（三）基于 ZPD 的游戏/表演教学研究

Vygotsky 特别强调游戏在认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在游戏中，孩子创造了 ZPD[5]101。Flint 认为，语言游戏是 ZPD 内的主导性活动，它能摆脱发展困境，开启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43]。

很多西方二语教育研究者将游戏和表演对 ZPD 的贡献相提并论。Haught 等指出，在二语课堂中使用戏剧/游戏（drama/play）将语言学习的复杂性框定在戏剧化表演的给养（affordances）之中，形成了 ZPD[44]。Swain 等也将游戏和表演看成是 ZPD 内具有重要语言学习潜力的资源，并通过叙事手段加以揭示[45]。Holzman 的研究发现，游戏和表演活动在课内外都具有创造 ZPD 的功能，是通向发展的“转换器”[16]。Wagner 提出，教育戏剧（education drama）是让二语学习者投身 ZPD 的完美媒介，因为在角色扮演活动中，学习者将语言以及所有的人物形象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以更加投入和积极的方式而非没有语境的平台来使用第二语言[46]。此类研究的不足是缺乏实证数据支撑。国内相关的实验教学研究表明，对英语教材内容、影视剧片段或自编短剧等进行表演教学，更容易激活学生的 ZPD，具有良好的促学效果[47]。

（四）基于 ZPD 的教师发展研究

ZPD 理论还被运用于二语教师发展研究。Nyikos 等的研究发现，同伴之间的多重讨论、观点交流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等社会调节能促进集体和个体 ZPD 呈指数级增长，其中情感因素的影响作用尤甚[48]。Shabani 等认为，影响教师 ZPD 发展的因素有导师、同行、语境限制、调节制品和技术等[49]。Shabani 进而提出：教师的 ZPD 不只限于教育者的支持，还包括同事合作、行动研究、实习经历及 TESOL 话语等；影响 ZPD 推进的因素包括合作同伴与导师、环境、学生成就数据、日记写作等；为了保持 ZPD 的动态性，职前或在职语言教师应积极参与上述活动，利用各种资源不断学习和发展，从而实现其职业生涯的专业成长[50]。Warford 等则明确提出了“教师的最近发展区”（ZPTD）概念，并探讨其不同于学生 ZPD 发展的路径和影响因素，指出教师发展从自我支架开始，而学生发展从他人支架开始[51]。以上这些研究为

ZPD 在二语教育中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揭示了个体与集体 ZPD 之间的关系。在教师教育教学中同伴合作创造的支架指导环境下，小组 ZPD 具有促进构建个体知识和共同理解话题的潜力[48]。Guk 等发现，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不是创造了两个不同的 ZPD，而是全班一致的 ZPD[52]。van Compernolle 等通过对课堂师生教学对话的微变化分析，发现小组 ZPD 内的合作对话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社会语言能力，即使是同一小组的学习者，也需要一定量适合其个体 ZPD 的支架帮助以发展其语用能力[53]。这说明个体与集体 ZPD 之间既相通又有异，需要区别对待。

三、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ZPD 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廓清

如前所述，由于缺乏一致的判断标准和操作原则，学界一直存在对 ZPD 理解上的多样性和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关系的模糊不清[7－8]。在二语教育研究领域，学界对 ZPD 的学理反思也没有充分实现问题的化解，相关分支概念的运用存在交叉和模糊地带[54]。除 ZPD 与“i+1”关系之争外，有研究认为，ZPD 就是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支架互动（如 Rogoff 等[3]）。Lantolf 等指出：在 ZPD 范畴内，焦点显然是在学习者身上；而在支架活动中，控制权落在教师和专家手中[3]274。Xi 等进一步指出，ZPD 与支架二者存在本质差异，在过程和范围等方面都显著不同，ZPD 是一个更复杂、动态且对情境敏感的发展框架，而 Scaffolding 仅能部分映射其外显互动特征[55]，二者在理论深度、隐喻内涵及发展目标上存在本质差异。笔者认为，ZPD 基于学习者，是抽象的、隐性的，只有在学习者的互动反应中才体现出来，而支架来自外部世界，是具体的、显性的，应根据学习者的 ZPD 发展需要予以提供。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关系是：一些学者主张 ZPD 是一种活动，那么这种“活动”与日常社会和娱乐活动有何区别和联系？如果真如 Chaiklin 所言，任何一种掌握了某种技能或获得了一些理解的活动都是 ZPD[6]，那么其概念是不是又太宽泛了？在实际研究中究竟该如何操作？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二）ZPD 理论与外语教学实践结合应更紧密

ZPD 研究的意义在于为教学提供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学习者水平诊断模式，从而更精准地了解学习者潜力，实施更接近真实的评估和更具针对性的教学。然而，现有研究中不少仅套用 ZPD 概念和理论，未能严格对标该理论框架，紧密结合外语教学具体情境深入分析 ZPD 的判定方法，以及学习者如何实现基于 ZPD 的二语能力发展，或依据该理论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Lantolf 等[15]149 提醒注意：ZPD 不同于“最近学习区”（zone of proximal learning，ZPL），但在二语教学实践与研究中究竟如何区分并有效测量它们？如何在二语教学的词汇、语法、阅读、写作、听力，乃至语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培养等方面进行 ZPD 理论指导下的有效操作？哪些因素影响甚至决定了集体或个体 ZPD 的大小？对于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虽然各方面都偶有零星研究，但一是不够系统，二是理论探讨与实践融合不够深入，未能切实运用 ZPD 理论解析相关操作的理据，分析相关结果。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有待优化

由于 Vygotsky 对微变化研究的极力推崇，国外很多 ZPD 相关研究都运用这一方法，如 de Guerrero 等[22]、Lapkin 等[21]、van Compernolle 等[53]。微变化法通过对学习过程的记录与分析，“可以捕捉到飞逝的变化过程”[5]68，能更清楚地揭示学习者 ZPD 的发展轨迹。不过，现有研究多采用录音手段收集实验教学环境下的语料，未能将学习者在自然条件下接受支架帮助或语言调节时的表情、眼神、手势等准确地记录下来，没有较好地反映学习“潜势”。近年的研究如 Poehner 等[40]已采取录像和计时软件等方法收集数据，代表了最新趋势。人们若能对自然状态下的学习过程进行录像，并辅以高频度访谈和叙事等质化手段，以多渠道收集多模态信息，则可对学习者的二语 ZPD 做出更准确的判断。网络信息技术和现代摄录设备的普及为这些手段的运用提供了可能。

四、未来研究展望

（一）ZPD 理论的本体研究

鉴于当前学界对 ZPD 解读的多样性和相关判断标准的缺失，以及 ZPD 与相关邻近概念之间的模糊现状，学界有必要加强对 ZPD 的本体研究。尽管不同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二语学习中的 ZPD 概念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3-4, 15, 16]，但都各有偏重、莫衷一是，也给后续研究带来困惑和不便。学界可以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在国际学术期刊举行专题研讨等方式，或成立相关学术组织对其在二语教育研究中的工作定义进行明确，对其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的解读原则、操作规范和研究方法等进行深入研讨，以达成共识，方便后续研究。

ZPD 理论原本是一个教育心理学构念，要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二语教育，离不开教育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乃至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支撑。因此，未来研究亦可以 ZPD 为主轴，探究如何将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到二语教育中去，也可将 ZPD 与二语习得相关理论结合，构建更加全面的学习模型，以探索 ZPD 在不同语言学习环境（如在线学习、混合式学习等）中的应用。

（二）ZPD 内二语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学习者的 ZPD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学习风格、动机和先前的知识等，教师需要根据学习者的整体情况和个体差异来调整教学策略。正如 Holzman 指出的，集体构建的合作活动对解决个体心理和认知发展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因为这创造了“情感发展区”（zone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16]29。一些研究探讨了情感与 ZPD 内发展之间的关系，要求注意集体活动和情感在 ZPD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56－57]。未来可以通过组织表演、角色扮演和工作坊等集体教学活动来展开研究，关注学习者情感（如学习动机、焦虑、成就感等）对 ZPD 发展的作用。

Ohta 指出，ZPD 内帮助的本质会随着帮助者的专业知识、任务的性质、任务的设计、参与者目标、学习者水平和投入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25]76。Obukhova 等研究发现，支架的水平、支架提供者所运用的调节手段、干预的时机等都会直接影响学习者 ZPD 发展的进程[58]。因此，上述因素如何分别或共同影响学习者在 ZPD 内的二语能力发展，值得进一步研究。随着 AI 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人机互动的日益普及，线上资源和智能体如何促进学习者外语水平在 ZPD 内的发展，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新领域。

（三）基于 ZPD 的 DA 应用研究

DA 是 ZPD 理论应用的一个重点。未来研究可围绕 DA 如何更好地揭示并促进 ZPD 的发展展开。研究者可以运用 Aljaafreh & Lantolf 的“调节尺度”量表探讨我国语境下二语教育中不同调节尺度对师生共建 ZPD 的影响效果，也可以根据我国学生对帮助的反应特点改进或重新构建量表，以更好地测定其 ZPD。Poehner 等指出，Kozulin 等设计的学习潜力计算公式（LPS）[35] 能否在考试之外预测学习者的成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40]346。现有研究多基于个案或小群体，鉴于我国外语课堂学生人数较多的实际情况，如何针对学生有效开展 DA，准确地识别和测量学习者的 ZPD，并探讨个体 ZPD 与集体 ZPD 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教学的作用，是我国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研究者亦可对 Kozulin & Garb 的学习潜力计算公式和 Poehner 的教学、评估一体化模型[37] 展开验证和复制研究，甚至开发更精确和有效的 ZPD 评估工具。

Poehner 等提出，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 ZPD 中再生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教育实践中更好地平衡二者，比如通过 DA 来诊断学习者的再生产和创造能力，或设计教学活动来同时促进这两方面的发展[17]。

五、结语

本文对 ZPD 的概念及其在二语教育中的不同解读及应用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尽管限于篇幅，未能涵盖所有相关研究，但正如 Lantolf 等指出的，ZPD 是 Vygotsky 实践观的一个强有力的表述，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能够深刻理解活动参与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能同时驱动这一发展的理论视角[15]167。通过支架活动和动态

评估促进学习者发展，是 ZPD 的核心思想，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希望本文能够促进学界对 ZPD 视域下外语教育教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ALJAAFREH A, LANTOLF J P. Negative feedback as regu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4, 78(4): 465 − 483.

[2] 王颖. 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12): 180 − 183.

[3] LANTOLF J P, THORNE S L.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 OHTA A S.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in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J]. System, 2005, 33(3): 503 − 517.

[5] 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M]. Cambridge: MIT Press, 1978.

[6] CHAIKLIN S.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in Vygotsky's analysis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C]//KOZULIN A, GINDIS B, AGEYEV V S, et al. Vygotsky's Educational Theory in Cultural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9 − 64.

[7] KINGINGER C. Defining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in U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2, 23(2): 240 − 261.

[8] LANTOLF J P, PANAHI A, MOHEBBI H. James Lantolf's 50-year research contribution to SLA through sociocultural theory: a systematic review[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Quarterly, 2024, 46(4): 362 − 402.

[9] 张福慧, 魏惠琳. 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诠释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97 − 100.

[10] OHTA A 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cesses in the Classroom: Learning Japanese[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11] GUERRA C. Krashen's i + 1 issue revisited from a Vygotskian perspective[J]. TESOL-GRAM (The Official Newsletter of Puerto Rico TESOL), 1996, 23: 7 − 8.

[12] DUNN W E, LANTOLF J P. Vygotsky's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and Krashen's i + 1: incommensurable constructs; Incommensurable theories[J]. Language Learning, 1998, 48(3): 411 − 442.

[13] THORNE S L.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and some truth(s) about relativity[C]//LANTOLF J P.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9 − 243.

[14] KINGINGER C. i + 1 #ZPD[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001, 34(5): 417 − 425.

[15] LANTOLF J P, POEHNER M E.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Pedagogical Imperative in L2 Educ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6] HOLZMAN L. Vygotsky at Work and Pla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7] POEHNER M E, LANTOLF J P. The ZP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transposition - transformation dialectic[J]. Cultural-Historical Psychology, 2021, 17 (3): 31 − 41.

[18] HOLZMAN L. Zones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mundane and magical[C]//LANTOLF J P, POEHNER M E, SWAIN M.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42 − 55.

[19] NASSAJI H, SWAIN M. A Vygotskian perspective on corrective feedback in L2: the effect of random versus negotiated help on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articles[J]. Language Awareness, 2000, 9(1): 34 − 51.

[20] LANTOLF J P, ALJAAFREH A.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a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5, 23(7): 619 − 632.

[21] LAPKIN S, SWAIN M, PSYLLAKIS P. The role of languaging in creating zones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s): a long-term care resident interacts with a researcher[J].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2010, 29(4): 477 − 490.

[22] DE GUERRERO M C M, VILLAMIL O S. Activating the ZPD: mutual scaffolding in L2 peer revision[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0, 84(1): 51 − 68.

[23] NASSAJI H, CUMMING A. What's in a ZPD? A case study of a young ESL student and teacher interacting through dialogue journals[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00, 4(2): 95 − 121.

[24] OHTA A S. Applying sociocultural theory to an analysis of learner discourse: learner-learner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in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J].

Issu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1995, 6(2): 93－121.

[25] OHTA A S. Rethinking interaction in SLA: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assistance in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2 grammar[C]//LANTOLF J P.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1－78.

[26] MCCAFFERTY S G. Gesture and creating zones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2, 86(2): 192－203.

[27] KHALILIAQDAM S. ZPD, scaffolding and basic speech development in EFL context[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98: 891－897.

[28] 贾光茂, 方宗祥. 激活最近发展区: 大学英语课堂交际活动中教师及同伴支架作用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 17(3): 84－87; 91.

[29] 盖淑华. 最近发展区中的词块习得实证研究——基于支架式教学的实验报告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5): 68－72.

[30] 张姗姗, 徐锦芬. ZPD 视角下在线自动反馈对英语不同水平学习者写作的影响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9(5): 30－39; 148.

[31] 陈菁, 李丹丽. ZPD 视角下基于思辨力培养的教师实时性支架构建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4): 115－124.

[32] DAI S S. Experiences of a Chinese English learner in the framework of sociocultural theory: an autoethnography[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Series, 2024, 1: 185－191.

[33] POEHNER M E, LANTOLF J P. Advancing L2 dynamic assessment: innovations in Chinese contexts[J]. 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 2023, 20(1): 1－19.

[34] POEHNER M E. Dynamic Assessment: A Vygotski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L2 Development[M].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35] KOZULIN A, GARB E. Dynamic assessment of EFL text comprehension[J].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02, 23(1): 112－127.

[36] POEHNER M E, LANTOLF J P. Bringing the ZPD into the equation: capturing L2 development during Computerized Dynamic Assessment (C-DA)[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3, 17(3): 323－342.

[37] POEHNER M E. Validity and interaction in the ZPD: interpreting learner development through L2 Dynamic Assess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1, 21(2): 244－263.

[38] POEHNER M E.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and the genesis of self-assessment[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2, 96(4): 610－622.

[39] VAN COMPERNOLLE R A, KINGINGER C. Promoting metapragmatic development through assessment in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3, 17(3): 282－302.

[40] POEHNER M E, ZHANG J, LU X F. Computerized dynamic assessment (C-DA): diagnosing L2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learner responsiveness to mediation[J]. Language Testing, 2015, 32(3): 337－357.

[41] BAKHODA I, SHABANI K. Response latency as a tool to study L2 Learners’ ZPD, ZAD and ongo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J].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16, 1(1): 2.

[42] INFANTE P, POEHNER M. Realizing the ZPD in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the complementary contributions of dynamic assessment and mediated development[J]. Language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 2019, 6(1): 63－91.

[43] FLINT K J. A Derridaean reading of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the monster in the play of *différence*[J]. Educational Review, 2009, 61(2): 211－227.

[44] HAUGHT J R, MCCAFFERTY S G. Embodied language performance: drama and the ZPD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C]//LANTOLF J P, POEHNER M E.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Teaching of Second Language. London/Oakville: Equinox, 2008: 139－162.

[45] SWAIN M, KINNEAR P, STEINMAN L. Sociocultural Theory in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hrough Narratives[M]. 2nd ed.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5.

[46] WAGNER B J. Understanding drama-based education[C]//BRÄUER G. Body and Language: Intercultural Learning through Drama. Westport, CT: Ablex Publishing, 2002: 4－18.

[47] 高瑞阔, 邓景春, 刘欢欢. 基于 ZPD 理论的“以演促学”英语教学研究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6, 29(7): 89－92.

[48] NYIKOS M, HASHIMOTO R. Constructivist theory applied to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teacher education: in search of ZPD[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7, 81(4): 506 − 517.
[49] SHABANI K, KHATIB M, EBADI S. Vygotsky's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instructional implication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0, 3(4): 237 − 248.
[50] SHABANI K.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rom Vygotskian optique[J]. Advanc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ry Studies, 2012, 3(2): 101 − 120.
[51] WARFORD M K. The zone of proximal teacher development[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1, 27(2): 252 − 258.
[52] GUK I, KELLOGG D. The ZPD and whole class teaching: teacher-led and student-led interactional mediation of tasks[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07, 11(3): 281 − 299.
[53] VAN COMPERNOLLE R A, WILLIAMS L. Promoting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in the classroom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2, 16(1): 39 − 60.
[54] 张巍, 刘富华. 实践与反思: 二语习得研究视域下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解读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1): 111 − 116.
[55] XI J, LANTOLF J P. Scaffolding and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a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J].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21, 51(1): 25 − 48.
[56] NEWMAN F, HOLZMAN L. Lev Vygotsky: Revolutionary Scientist[M].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4.
[57] LEVYKH M G. The affectiv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Vygotsky's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J]. Educational Theory, 2008, 58(1): 83 − 101.
[58] OBUKHOVA L F, KOREPANOVA I A.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a spatiotemporal model[J]. Journal of Russian &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 2009, 47(6): 25 − 47.

（责编：朱渭波）